

犍陀罗民间文学的多元构成 ——基于公元1-4世纪雕刻图像的考察

蔡 枫

(深圳大学 印度研究中心 广东 深圳 518060)

摘要:以公元1-4世纪的犍陀罗雕刻图像为研究对象,通过图文互证,剖析这个时期犍陀罗民间文学的构成要素。认为犍陀罗民间文学的核心是印度民间文学,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杂糅了波斯民间文学、希腊罗马民间文学等外来民间文学要素。犍陀罗民间文学的多样性源于犍陀罗地区的多元文化语境。犍陀罗地处东西方文化交汇之地,历史上东西各种文明形态交替频仍,宗教信仰驳杂,各种宗教都利用自己的或他人的民间文学进行传教,于是造成犍陀罗民间文学的多样性特征。

关键词:犍陀罗;民间文学;多元性;印度

中图分类号: I106.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79(2012)06-0101-07

The Multi-composition of Gandhara Folk Literature

——An Investigation of Carved Images from the 1st to the 4th Century A. D.

CAI Feng

(Centre for Indian Studies, Shenzhen University, Shenzhen, Guangdong 518060,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takes the Gandharan carved images from the 1st to 4th century A. D. as the re-searching objects, and analyzes the composing elements of Gandharan folk literature in this period through graphic text demonstration. Indian folk literature is the core of Gandharan folk literature. In the process of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carved images, it hybridized the folk literatures of Persian, Greco-Roman and many other exotic elements. The diversity of Gandharan folk literature derives from the multi-culture background of Gandhara area. Gandhara is located in the cultural intersection of the east and the west. Historically, various Eastern and Western civilizations interchanged dramatically. There were farraginous religious beliefs and different kinds of religions, which undertook missionary work through their own or exotic folk literature, leading to the diversified characteristics of Gandharan folk literature.

Key words: Gandhara; folk literature; diversity; India

犍陀罗位于印度次大陆西北部,印度河西岸,包括今天的白沙瓦河谷斯瓦特(Swāt)、巴奈(Buner)和巴爵尔(Bajaur)一带。古代犍陀罗分为阿巴拉·犍陀罗(Apara Gandhara)和布尔瓦·犍陀罗(Pūrva

收稿日期:2012-02-28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项目“犍陀罗雕刻艺术与民间文学关系考证”(项目编号:09BWW025);深圳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犍陀罗艺术研究学术史》(项目编号:10QNCG08)

作者简介:蔡枫(1979-),女,广东汕头人,文学博士,深圳大学印度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印度艺术、印度宗教文化。

Gandhara) 前者以沙萨达(Charsadda, 古称 Puṣkalāvātī, 布色羯罗伐底, 即白沙瓦附近) 为中心, 后者以塔克西拉(古称 Takṣaśilā) 为中心。^[1] 犍陀罗在列国时代是印度北边十六大国之一。玄奘《大唐西域记》所记载“健驮逻国东西千余里, 南北八百余里, 东临信度河。国大都城号布路沙布逻”,^{[2] (P233)} 指的是阿巴拉·犍陀罗; 而其所指的坦叉始罗国, 即为布尔瓦·犍陀罗。从文化地理看, 犍陀罗作为印度次大陆通往外部世界的门户, 具有优越的文化地缘优势, 立足西南边的印度文化, 东临中亚和中国文化, 西接古波斯文化, 是东西方文化交汇之地。

这种特殊的人文地理, 使犍陀罗民间文学带着明显的东西方文化碰撞的痕迹。“民间文学不仅是一种文学, 更是一种文化和生活”, 是“承载和认识文化传统的文本”, 具有浓厚的生活属性, 是“一个民族的历史、宗教、信仰、伦理、民俗等等留有先民的心理痕迹和经验残余的语言符号, 是一个区域民族的心理生活和现实生活在历史的进程中不断演化的符号”。^{[3] (P95, 86, 41)} 民间文学具有口头性、集体性、传承性和变异性, 是一种活态的文学, 在流传中变动, 在变动中流传。因而, 欲从文字文本进行纵向的对比研究, 爬梳剔抉出犍陀罗民间文学所体现的各种文化要素, 会由于文本缺失等原因显得非常困难, 但从人类学和文化传播学的理论和出土的叙事性犍陀罗艺术雕刻作品可推测, 公元 1 世纪至 4 世纪间, 犍陀罗地区流传的民间文学主要源自印度民间文学, 同时受到波斯民间文学和希腊罗马民间文学的重要影响。所以, 印度民间文学是犍陀罗民间文学的主要构成。

一、犍陀罗民间文学的印度因素

印度民间文学在犍陀罗地区的传播至少可以追溯到印度列国时代。佛陀·布拉伽斯(Buddha Prakash) 的书中记载到“犍陀罗崛起的一个有意义的结果, 就是它的都城塔克沙西拉发展成为学习和教育的中心、文化和商业的中心。”“摩揭陀国的学者不远万里, 穿越印度北边的广阔地区到塔克沙西拉来上大学。我们从巴利语文献中知道, 婆罗门青年, 刹帝利(Khattiya)、以及来自王舍城(Rājagṛha)、迦尸国(Kāśī)、乔萨罗(Kosala) 及其他地方的舍地(Setthis) 都往塔克沙西拉去学习吠陀经等 18 种科学知识及艺术。”^{[4] (P76)} 可见, 犍陀罗民间文学发源于吠陀神话传说。吠陀神话是印度神话的滥觞, 约产生于公元前 1500 年至公元前 1000 年。吠陀神话和其后问世的梵书、森林书、奥义书和两大史诗、往世书, 形成了印度庞大的神话体系。

两大史诗曾经广泛流传于犍陀罗地区。产生于印度西部的《摩诃婆罗多》成书之前已在犍陀罗地区流行,^{[5] (P6)} “《摩诃婆罗多》提到哈提提纳普拉罗阇贾亚征服了这座城市(指塔克西拉), 并在此举行蛇祭。蛇祭期间吟诵了整部《摩诃婆罗多》”。^{[6] (P47)} 20 世纪, 尼雅古城出土的以犍陀罗语书写的《摩诃婆罗多》残片进一步证实了史诗在犍陀罗地区的流传。这个残片的内容如下: “就像行路人感到疲惫而在这里或那里歇息, 而后精力逐渐得到恢复。人之初精力旺盛, 而后精力枯竭; 人之初受到赞美, 而后受到责骂; 人之初心中悲伤, 而后喜悦; 人之初乐善好施, 而后向人乞讨。有人因为吝啬, 既不舍弃他们的财产, 又不能正当地享用他们的财产, 已经失去种种愉快, 正刺痛着他们的心。犹如贪婪者不断地将其所有谷物堆放在谷仓而饥馑发生时全被焚为灰烬一样, 穷人的命运啊! 那些不知享受或分配(自己财富)的富人的命运呀!” 据英国语言学家考证, 这个文学残片的第二段出自《摩诃婆罗多》浦那版第 36 - 44 颂。^{[7] (P232)} 另一部史诗《罗摩衍那》的故事也深受古代犍陀罗民众的欢迎。20 世纪初出土的一块石阶雕刻(图 1), 以线性叙事方式刻画一男子射鹿的情景。英国学者兹渥夫(W. Zwalf) 认为, 这块石雕产生于公元 1 世纪, 再现了《罗摩衍那》第三篇第 42 章至 51 章的两个情节。^{[8] (P236)} 画面最右边已残缺, 叙事从右至左是悉多和金翅鸟阇吒优斯(Jatāyus); 罗摩拉弓射击化作金色鹿的摩哩遮(Mārīca); 罗摩进入净修林; 罗波那(Ravana) 变成出家人的样子, 走近悉多, 企图诱拐悉多, 悉多以礼相待, 向他讲述自己的身世。

① 据学者考证,《摩诃婆罗多》成书年代为公元前 4 世纪至公元 4 世纪之间, 现存的形式不晚于公元 4 世纪。



图1 《罗摩衍那》雕刻残片 现藏于大英博物馆

堪称神话传说百科全书的往世书在印度民间的流传最为广泛,其地位不亚于两大史诗。20世纪犍陀罗出土的公元2-3世纪的两块浮雕残片(图2),根据高宾纳特·拉奥(Copinātha Rao)的考证,图像刻画的是《薄伽梵往世书》(Bhāgavata Purāna)第十章的两个经典情节:黑天(Kṛṣṇa)大战刚沙派来的野兽;黑天角斗穆斯塔卡(Mustak)和迦努尔(Chānur)。^{[9] P163-164}这说明公元2-3世纪往世书的神话故事在犍陀罗民间广为传播。



图2 《薄伽梵往世书》雕刻残片 现藏于美国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

除了两大史诗、往世书外,印度古代广为流传的民间文学还有本生故事和《五卷书》。本生故事意为佛陀前生的故事,尽管包裹着佛教的外衣,但实际上与往世书、两大史诗中的故事一脉相承。犍陀罗和印度其他地区出土的一系列本生雕刻,画面所刻画的情节,与《摩诃婆罗多》、《罗摩衍那》及往世书中的故事非常相似。《罗摩衍那》中的十车故事、《摩诃婆罗多》中的睽摩故事、鹿角仙故事皆出现在相应的雕刻之中。“往世书中的故事如黑天、豆腐陀和沙恭达罗、哈里什昌德拉国王和尸毗王则分别对应着智达本生、伽特哈里本生、须大拿本生和尸毗王本生。”^{[10] P31}随着佛教的传播,本生故事对犍陀罗民间文学的影响显得更为直接。本生故事形成的年代早于佛教时代,“源于世代相传下来的以散文体创作的神话和传说,夹杂着韵文诗,产生于前佛教时代。这些故事保留了印度民间故事的原始面貌。本生故事在成型的过程中,大部分的故事移植了当时北印度的民间故事。这就是为什么本生故事中提及很多佛教时代之前的北印度政治社会状况”^{[10] P26}从这段论述,可推测本生故事在犍陀罗地区的传播早在佛教传入之前。佛本生故事形成文本的时间最迟可追溯至公元前3-2世纪,因为这个时候,本生故事就已出现在巴尔胡特窄堵坡的围栏上。而犍陀罗在公元前2世纪就产生了以本生故事为表现内容的雕刻品,佛教的传入无疑强化了本生故事在犍陀罗地区的传播和接受。与此同时,《五卷书》里面的一些故事也早已在犍陀罗地区流传,“《五卷书》中的故事在南亚的传播是最早而且最广泛的。因为在印度,

先于《五卷书》出现的佛本生故事中已经包含有《五卷书》里的故事。而佛教典籍的传播早在公元前就到达了五印度各地”。^{[11] (P160)} 大约在公元 6 世纪,《五卷书》的传本传到了波斯,翻译成当时的波斯语。《五卷书》至少在 6 世纪以前就在犍陀罗地区流传了很长一段时间。

二、犍陀罗民间文学的外来因素

以印度民间文学为根基,以波斯、希腊等外来民间文学为枝蔓,构成了 1—4 世纪犍陀罗民间文学的基本结构。波斯文化与印度文化具有很大的亲缘性,从语言、文学和民俗可见一斑。书写古波斯琐罗亚斯德教经典《阿维斯塔》的阿维斯塔语与印度梵语非常接近,同属于印欧语系,“《阿维斯塔》中的很多人物和传说都可以与印度古代文献《吠陀》互相印证”,^{[12] (P8)} 如波斯的天神阿胡拉,对应印度的阿苏拉神;波斯魔鬼迪弗,对应印度善神弥达瓦;波斯的太阳神密特拉对应吠陀神话中的密多罗,等等。而古波斯崇拜火,每年举行马祭和苏摩祭,在古代印度也流传着同样的习俗。^{[13] (P73)} 同样的,波斯民间文学和印度民间文学也具有亲缘性。《列王纪》中苏达贝王妃和夏沃什王子钻火堆、评判是非的故事情节与《罗摩衍那》里罗摩的妻子悉多纵身火海以证贞洁的故事如出一辙。犍陀罗民间文学对波斯民间文学的吸收和传播具有先天性的优势。波斯的民间文学源头可追溯至约产生于公元前 11 世纪的,成书于萨珊时期的《阿维斯塔》。这部古波斯人集体创作的文学经典,包含着许多古代神话和传说,成为波斯民间叙事文学的滥觞。在《阿维斯塔》编成之前,其内容已在印度民间流传。公元 2 世纪,萨珊王朝的第二任帝王沙普尔一世曾“下令将《阿维斯塔》中有关医学、星相学、哲学和地理方面的内容,从希腊和印度等地收集起来,增补到圣书中去”。^{[14] (P346)} 产生于公元 4 世纪的波斯史诗《列王纪》随着犍陀罗萨珊时代的到来,也对犍陀罗地区的民间文学产生了影响,《列王纪》中的一个片段《鲁德斯姆与苏赫拉布的故事》,很早就改变成当地民间故事,^{[15] (P21)} 亚历山大东征的故事、摩尼的故事,在犍陀罗地区更是广为流传。

希腊文化对犍陀罗的影响不言而喻。亚历山大远征印度次大陆,为犍陀罗地区带来希腊化的种子,^{[16] (P13)} 至孔雀王朝时期,希腊人在犍陀罗地区已初具规模,巴基斯坦马尔丹县出土的阿育王铭文记载道“全体人员分族而居,他们为人们的友好与欢乐而保持着良好的道德,他们熟知道德,以至希腊人、甘蒲惹人、犍陀罗纳姆人、拉梯加纳姆人、比迪尼加纳姆人,以及所有在我的西北边境上的人们也都如此。”^{[6] (P65)} 这说明早在孔雀王朝时期,希腊人就与犍陀罗人毗邻而居,在文化和文学上互相渗透。希腊语成为当地的主流语言之一,一些出土的钱币上同时出现希腊语和佉卢语;有些阿育王铭文也同时出现阿拉米语和希腊语。孔雀王朝衰落后,居住在希腊化时期希腊人原掌控的两个王国——大夏和安息希腊人接踵而来,他们对犍陀罗文化的希腊化起决定性的作用。这两个王国在文化、服装、语言、生活习俗等方面,无不沿袭希腊传统,甚至于其所使用的希腊语,由于“观念和文学与文学作品的深入渗透”,“丝毫都没有‘蛮夷化’”。^{[17] (P74,73)} 语言是文学的载体,希腊语的流行,伴随的是希腊文学在犍陀罗地区的流传。普鲁塔客曾经在《亚历山大之幸运或业绩》中描述了这样的事实“在亚历山大所征服的那些亚洲地区,波斯、苏萨以及伽德罗西亚的儿童们都学习背诵索福克勒斯与欧里庇得斯的悲剧。”^{[17] (P79)} 希腊的神话人物如爱神阿芙洛狄忒、胜利女神、海神、大力神赫拉克勒斯、阿波罗等出现在钱币、银制酒器、雕塑作品上,足以说明古典希腊民间故事在犍陀罗地区的传播。尤其是在西尔卡普、斯瓦特、沙萨达等地出土的一系列叙事性石雕圆盘,形象地再现希腊神话故事。这一系列的石雕圆盘大小不等,目前发现的约有 140 多个,由片岩、皂石、粘土岩等雕刻而成,饰有与希腊神话相关的人物、动物或场景的浅浮雕。刻画的神话人物包括阿波罗、达芙妮、狄俄尼索斯、阿耳特弥斯、阿克泰翁、赫拉克勒斯、翁法勒、阿里阿德涅、阿芙洛狄忒、厄洛斯、阿多尼斯、伽倪墨得斯、提托诺斯、恩底弥翁、柏勒洛丰、希波吕托斯、帕琉斯等。从主题学角度考察,可分为情爱主题如表现阿耳特弥斯和阿克泰翁的故事(图 3);欢乐主题如描绘阿里阿德涅与狄俄尼索斯婚礼的画面(图 4);海神主题如刻画水仙女骑着海马奔驰于大海的情形(图 5),等等。



图3 《阿耳特弥斯和阿克泰翁》
现藏于英国大英博物馆



图4 《阿里阿德涅与狄俄尼索斯的婚礼》现藏于印度国家博物馆



图5 水仙女骑着海马
现藏于大英博物馆

犍陀罗受希腊、罗马影响历来是争论的热点。罗马从公元前3世纪开始直接接触希腊文化,这个时期与希腊文化输入印度次大陆的时间基本相同。罗马利用地缘优势,大量吸收希腊文化,哲学、文学、戏剧和美术无不继承希腊文化的衣钵,希腊化程度之高,以至于“本来其神性跟希腊宗教毫无关系的罗马诸神,后来也都分别把他们对比作希腊奥林匹斯诸神,所以,自古‘希腊罗马神话’就被混为一谈”。^{[18] (P445)} 罗马文化输入犍陀罗主要是在贵霜时期,通过商贸的方式输入物质文化,与此同时,伴随而来的是罗马民间故事在犍陀罗地区的流传。从文学发展史的角度看,这些外来的民间文学因素无疑丰富了犍陀罗民间文学的内容,拓展了犍陀罗民间文学研究的维度,但始终是非主流(文学),主流仍是印度民间文学。

三、犍陀罗地区的多元文化语境

犍陀罗民间文学多元性源于犍陀罗地区的多元文化语境。历史上,犍陀罗地区受到印度、波斯、希腊、罗马等文化的影响。公元前559—557年间,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的居鲁士征服犍陀罗。而后,在大流士一世统治期间(公元前522—486年),古波斯语阿拉米语被定为当地的官方语言,后迎合犍陀罗的俗语(Prakrit)发展为大众文字——佉卢文。^{[4] (P78)} 波斯文化对犍陀罗地区的影响由政治波及文学。古波斯文化在犍陀罗地区传播了近百年之后,随着希腊亚历山大征服波斯,希腊文化随之进入犍陀罗地区,持续时间逾百年,即从公元前330年阿契美尼德王朝结束到公元前90年,犍陀罗地区最后一位国王被击败。希腊文化对犍陀罗文化所产生的全方位影响,举世皆知,以至于犍陀罗艺术成为“希腊—印度”艺术样式的代名词。在此期间,强盛的印度孔雀王朝,曾一度控制犍陀罗地区。公元1世纪前后,塞种—安息人的一些国家和希腊人建立的一些国家在犍陀罗交错并存。从公元60年到公元390年,是贵霜人统治时期。贵霜帝国进一步开拓了犍陀罗地区与中亚和西方的贸易通道,通过商贸往来,安息和罗马的文化传入犍陀罗地区。在贵霜王朝末期,波斯萨珊国王曾短暂征服犍陀罗地区,再次输入波斯文化。在公元1—4世纪间,犍陀罗地区的文化要素至少包含印度文化、波斯文化、希腊罗马文化,因而,这个时候的犍陀罗民间文学作为当时社会文化的映像,显然包含诸多文学成分。

如果说,东西方诸种文化形态的频仍更替“历时”地赋予犍陀罗民间文学多元性,那么犍陀罗地区驳杂的宗教体系则“共时”地塑造了犍陀罗民间文学的多元性。宗教是古代印度社会文化的核心,民众普遍信仰宗教,从意识形态、生活方式到民间文学,无不蒙上宗教的彩色。犍陀罗地区亦然,民众基本上都敬神。犍陀罗文化语境的核心内容是宗教。由于多种文化荟萃,王朝更替频仍,而使宗教信仰驳杂,所谓“天祠百数,异道杂居”。^{[2] (P232)} 公元二世纪,推崇佛教的贵霜统治者的钱币上,除了有佛陀造像外,还包含大量的波斯神祇,希腊的太阳神、月神、风神、火神、战神、胜利神,印度的湿婆神和各位战神,等等。遮亚·高斯瓦米(Jaya Goswami)根据出土文物断定,犍陀罗地区主要的宗教信仰有佛教、婆罗门教(包括湿婆派、性力派、毗湿奴派、战神迦絺吉夜崇拜和太阳神崇拜)、琐罗亚斯德教、摩尼教和民间夜叉崇拜。^{[19] (P46—61)} 婆罗门教各流派在犍陀罗地区流传甚久。印度河谷出土的湿婆原型——兽主(Paśupa-

ti) 说明早在前雅利安时代犍陀罗地区就已出现湿婆崇拜,而毗湿奴崇拜至少可追溯到公元前2世纪。^① 尽管在纪元后的数百年间,佛教主导了犍陀罗地区,然而不可忽视的事实是,婆罗门教依然盛行。贵霜统治者如阎膏珍(Vima Kadaphises)、胡韦色迦和韦苏提婆二世(Vasudeve II),既是佛教的倡导者,也是湿婆信仰和毗湿奴信仰的支持者。迦腻色迦的钱币上出现有湿婆坐骑——公牛和湿婆武器——三叉戟的图像。胡韦色迦的钱币上出现了胡韦色迦双手合十,跪拜于湿婆像前的图像。而从塔克西拉出土的4世纪的四手毗湿像可推断当地人崇拜毗湿奴或与毗湿奴相关的信仰。^{[19] (P55)} 7世纪玄奘游历的见闻进一步证明婆罗门教在犍陀罗地区的传承,《大唐西域记》卷二记载到“跋虏沙城东北五十里至崇山。山有青石大自在天妇像,毗摩天女也”,“山下有大自在天祠,涂灰外道式修祠祀。”^{[2] (P260)} 锁罗亚斯德教和摩尼教作为外来宗教,也兴于犍陀罗地区。锁罗亚斯德教在印度传播可以追溯到公元前4-5世纪,阿契美尼德和大流士统治期间,波斯的版图一度到达西北印度,锁罗亚斯德教流行于波斯全境。公元3-4世纪,在萨珊王沙普尔(Shāpūr)统治期间,犍陀罗地区大兴拜火教神庙,作为马兹达神的虔诚崇拜者,沙普尔以立法的形式推崇锁罗亚斯德教,他在铭文中写道“我,沙普尔,马兹达的崇拜者,伊朗和非伊朗的王中之王,属于诸大神的种族。由于得到诸大神的帮助,我们征服了许多土地,我们在各地区建立了胜利之火,我们对祭司仁慈并赞颂诸大神的事迹。”^{[20] (P192)} 沙普尔也力举源自伊朗的摩尼教,摩尼教的教主摩尼曾是沙普尔及其继任者霍米兹德一世(Hormizd I)的座上宾。摩尼教的理论融汇了基督教、锁罗亚斯德教和佛教诸种宗教的要素。因而,在宗教荟萃的犍陀罗地区,易为民众所接受。

存在于多宗教崇拜文化语境下的犍陀罗民间文学,不可避免带着强烈的宗教色彩。这首先在于民间文学大部分来源于各地的神话传说。神话作为宗教思想的载体,表达的是宗教的观念,如犍陀罗地区流传的吠陀神话,无不包含着吠陀教的原始思想;各种往世书以大量的神话故事传播婆罗门教思想;来自希腊的神话故事,所宣扬的是希腊的宗教文化。同样的,历史传说在流传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被宗教化。如包含数百个民间流传故事的《摩诃婆罗多》,其主干故事可以追溯至民间流传的英雄传说《胜利之歌》。根据德国学者丹德卡尔的研究,这部叙事诗的核心是“分裂、失国和胜利”,属于苏多传统^②的第一部文学经典。“许多古代叙事歌谣、尤其是那些称颂婆罗多族业绩的歌谣,肯定被增加进《胜利之歌》。”^{[5] (P170)} 这部历史叙事诗在传播的过程中转变成史诗《婆罗多》,为婆罗门教所用。婆罗门教徒“将大量有关婆罗门教的知识和文化材料纳入这部史诗,有时在史诗中适当的地方,而常常是在不适当的地方。婆罗门教的宗教、哲学、律法、伦理、宇宙观、神秘主义和社会政治理论整篇整篇窜入这部史诗”,^{[5] (P174)} 以宣扬婆罗门教的法、利、欲和解脱等思想。源自于《阿维斯塔》的波斯民间故事,在叙述传说中和历史上伊朗诸帝王英雄故事的时候,往往将其同善神信仰与祖先崇拜结合起来,折射出琐罗亚斯德教的宗教哲理。

其次,犍陀罗地区被印度教正统派认为是异教流传之地,此地民众,“多敬异道,少信正法”,^{[2] (P233)} 尤其是孔雀王朝以后,婆罗门教的势力相对薄弱,各种宗教得以在此传播。利用广泛流传于民间的各种传说和故事,以讲故事的形式向普罗大众宣讲教义,成为各种宗教寓教于乐的共同选择。佛教的传播从释迦牟尼时代就采用讲故事解说教义和戒律的形式进行传播。在佛陀去世后,佛教徒为扩大佛教的影响力,开始利用民间故事进行传教,约公元前3世纪,出现了佛本生故事。公元前2世纪,随着佛教传入犍陀罗地区,佛本生故事随之而来。这些故事大多数是长期流传于民间的家喻户晓的寓言、童话和传说,内容生动,寓意深刻。佛教徒将之改头换面,纳入佛本生故事,以便于百姓接受。实际上,这些故事在婆罗门教、耆那教的经典中也时有出现。“绝大部分的故事与佛教毫不相干,有的甚至尘俗十足。但是,佛教徒却不管这些,他们把现成的故事拿来,只须按照固定的形式,把故事中的一个人,一个神仙或一个动物制定为菩萨,一篇本生故事就算制造成了。”^{[21] (序言)} 改造后的民间故事便蒙上佛教的色彩,尤

① 希腊使者赫利俄多洛斯(Heliodorus)在其铭文中将自己描述成塔克西拉的居民和毗湿奴的崇拜者。这一铭文,证明至少在公元前2世纪,湿婆崇拜流传于犍陀罗地区。

② 丹德卡尔认为印度古代文学的开端呈现两种不同的文学传统,一是苏多(sūta,歌手)传统和颂诗(mantra)传统。苏多传统主要是颂唱人间英雄和世俗生活,而颂诗传统与宗教思想和实践有关。

其是故事的结尾,往往会有佛教的偈颂,宣传佛教的伦理道德。犍陀罗地区出土的本生雕刻所刻画的燃灯本生(*Dīpāṃśu Jātaka*)、睺睺子本生(*Śyāma Jātaka*)、尸毗王本生(*Sibi Jātaka*)、六牙象本生(*Shandanta Jātaka*)、弥兰本生(*Maitrakanyaka Jātaka*)、阿玛拉本生(*Amara Jātaka*)、须大拿本生(*Visvantara Jātaka*)、投身饲虎(*Vyaghra Jātaka*)本生等,以视觉叙事的形式宣传了佛教的核心价值观,如行善、布施、舍生、虔诚于佛、克制持戒,等等。从犍陀罗各地出土的公元1-4世纪间数以千计的佛传雕塑品,可以想象当时佛教徒借佛陀传奇的平生故事传播佛教的盛况。同样的,琐罗亚斯德教、摩尼教等宗教在犍陀罗地区的传播,为了达到更好的传播效果,无不例外改造当地民众家喻户晓的故事,以宣传自己的宗教理念。如果抽取掉犍陀罗民间文学中与宗教相关的部分,不难想象,犍陀罗民间文学将是一个空空如也的影子。

公元1-4世纪的犍陀罗民间文学的多元性源于犍陀罗地区的文化多样性和宗教复杂性,其表现或为印度民间文学、波斯民间文学、希腊民间文学和罗马民间文学等区域文学的交汇,或为婆罗门教文学、佛教文学、古希腊宗教文学和摩尼教文学与当地民间故事的嫁接。这种多元性既是空间的,也是时间的。从空间维度上看,诸种文明诸种宗教荟萃于此,使犍陀罗民间文学“此时”具有高度的包容性;从时间维度上看,文明主体的频仍变更,深刻影响犍陀罗民间文学的发展,使犍陀罗民间文学突破“此时”的包容性,而升华为“共时”的开放性。公元7世纪后,在伊斯兰文明席卷下,犍陀罗民间文学呈现出全新的伊斯兰特质,以至于犍陀罗民间文学原有的多样性几乎为当今的伊斯兰性所覆盖,所取代。图像之证在构建全面的犍陀罗文学史上显得有点捉襟见肘,但在古代犍陀罗民间文学文字记载缺乏和声音记录阙如的情况下,这些沉默而忠实的图像,不啻是研究古代民间文学的可信材料,图像之证不失为一种可靠的途径与方法。

参考文献:

- [1] N. P. Joshi, R. C. Sharma ed., *Catalogue of Gandhara Sculpture in the State Museum* [M]. Lucknow: Archana Printing Press, 1969.
- [2] 玄奘. 大唐西域记校注 [M]. 季羡林 等校注. 北京: 中华书局, 2000.
- [3] 万建中. 民间文学引论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 [4] [巴] 艾哈默德·哈桑·达尼. 历史之城: 塔克西拉 [M]. 刘丽敏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
- [5] 黄宝生. 《摩诃婆罗多》导读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5.
- [6] [巴] 默罕默德·瓦利乌拉·汗. 犍陀罗 [M]. 陆水林译. 北京: 五洲传播出版社, 2009.
- [7] 林梅村. 犍陀罗语文学与古代中印文化交流 [J]. 中国文化, 2001 (17 - 18).
- [8] W. Zwalf. *A Catalogue of the Gandhara Sculpture in the British Museum (Vol. II)* [M]. London: British Museum Press, 1996.
- [9] Stanislaw J. Czuma. *Kushan Sculpture: Images from Early India* [M]. Ohio: Cleveland Museum of Art, 1985.
- [10] B. Subrahmanyam. *Jātakas in Buddhist Thought and Art (Vol. I)* [M]. Delhi: Bharatiya Kala Prakashan, 2009.
- [11] 薛克翘. 印度民间文学 [M]. 银川: 宁夏人民出版社, 2008.
- [12] 张鸿年. 波斯文学史 [M]. 北京: 昆仑出版社, 2003.
- [13] 张朝柯. 波斯印度神话的比较 [A]. 陶德臻, 何乃英. 伊朗文学论集 [C]. 南昌: 江西人民出版社, 1993.
- [14] [伊] 贾利尔·杜斯特哈赫. 阿维斯塔—琐罗亚斯德教圣书 [M]. 元文琪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5.
- [15] 孔菊兰. 巴基斯坦民间故事 [M]. 银川: 宁夏人民出版社, 2008.
- [16] Madeleine Haleade. *Gandharan Art of North India and the Graeco - Buddhist Tradition in India, Persia, and Central Asia* [M]. New York: H. N. Abrams, 1968.
- [17] [匈] 哈尔马塔. 中亚文明史: 第二卷 [M]. 徐文堪译. 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2002.
- [18] 陈恒. 希腊化研究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6.
- [19] Jaya Goswami. *Cultural History of Ancient India—A Socio - Economic and Religio - Cultural Survey of Kapiśa and Gandhara* [M]. Delhi: Agam Kala Prakashan, 1979.
- [20] 龚方震. 晏可佳. 祇教史 [M].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8.
- [21] 佛本生故事选 [M]. 郭良鋆, 黄宝生译.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5.

(责任编辑: 张立荣)